

## 第十一章 北海地区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

### 一、加紧发动公开游击战争的准备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集中军事力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加紧采取步骤破坏和平谈判和破裂国共关系。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行动，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以“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由“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由“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到“打倒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共中央确定以“打倒蒋介石”最终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并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力求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的四个月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全面的军事进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在贯彻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为扭转败局、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不得不从后方抽调大批军队到前线，后方兵力空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各省出现了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新形势。这时，在北海地区已经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防，只有地方部队。加以国民党政府实行“三征”政策，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群众的反抗日益强烈。这样，北海地区党组织在农村发动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到来了。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指出，“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公开游击根据地”，“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条件之成熟”，但“总目标仍然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11月17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华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方方、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指出，“你们对各地武装应设法建立联络，尤其首先抽得力干部加强粤北（曲江）与南路两支队之领导，或以此两支队为基础建立粤北与南路特委”，“广东敌人兵力空虚，灾荒遍地，国民党又征兵征粮，因此造成了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的客观有利环境。应在党内消除过去认为广东特别长期黑暗，因而必须无限期埋伏之思想；广东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即在于全力布置游击战争”<sup>[1]</sup>。11月27日，广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开展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不违反长远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号召各地重新开展游击战争<sup>[2]</sup>。1947年1月14日至3月7日，广东区党委在香港湾仔举办各地党组织负责干部研究班，由方方、尹林平主持，方方在研究班上作《当前时局的特点》、《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问题》等报告，并举办了5期干部训练班，帮助干部认识广东游击战的意义、发展的条件、应走的道路和策略等，增强了必胜信心，为在全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sup>[3]</sup>。3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接着，广东区党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的“三征”，开展打倒

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要求各地在原有武装队伍的基础上组织游击武工队，分散活动，领导群众进行反“三征”和减租减息斗争，打击地主反动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广泛建立山区游击根据地，为大搞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广东区党委作出关于准备发动公开武装斗争的指示后，南路特委和各县党组织立即加紧各项准备工作。1947年1月中旬，正在香港参加干部研究班的南路特派员温焯华写信将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告知南路副特派员吴有恒。为了贯彻广东区党委关于准备发动公开武装斗争的指示，吴有恒收到温焯华的信后迅速抄转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并于1月22日在湛江市赤坎召开雷（州）、廉（江）、化（县）、吴（川）特派员联席会议，再次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分析了高雷地区的斗争形势，作出放手发展人民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实行“赤色割据”的决策。会议决定以廉江北部的粤桂边作为南路游击战争的活动中心，“南联遂溪，东联化（县）吴（川），西联合（浦）灵（山），北出广西”。随后，南路人民武装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游击队。因此，南路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扩大武装队伍，建立主力团，把南路人民武装斗争提高到新的水平。3月上旬，吴有恒与雷州特派员、遂溪军事小组成员等经过研究，决定成立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由吴有恒任代司令员。同时决定将各地游击队整编为团的建制。3月17日，以遂溪县4个游击中队为基础，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一团，金耀烈为团长，李晓农为政委。3月24日，把廉江独立大队扩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三团，团长为黄东明，周斌为政委。接着，以化（县）吴（川）游击队为基础，建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四团，罗明为团长，唐多慧为政委。

由于南路人民武装十分活跃，频频出击，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特别是人民武装击毙国民党遂溪县长戴朝恩的战斗，更震撼了全省。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深感南路人民武装的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决定调集重兵对南路人民武装发动“重点进攻”。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要求在各行政区设立“清剿”机构，限期肃清粤桂两省的“盗匪”，并命令广西的保安部队派兵来粤“协剿”。4月，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在湛江成立“粤桂南剿匪指挥部”，派林英为指挥官，把留在广东的唯一正规部队第六十九师一部调往南路。5月上旬，国民党不但把驻南路的保安第九、第十总队进行扩充，配足名额，而且增调广西保安第六总队到南路。这样，进攻南路人民武装的兵力多达3500人，分布在高州、雷州半岛地区，而重点则是遂溪、廉江、化县、吴川等县，妄图通过重点“清剿”，一举消灭粤桂边区人民游击队的主力。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的重点进攻，广东区党委决定加强党对粤桂边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于1947年4月上旬建立中共粤桂边地委，温焯华为书记，吴有恒为副书记，欧初为宣传部长。从3月22日到4月中旬，南路人民武装3个主力团连续作战多次，转战遂溪、廉江、化县，连战皆捷，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近一个月时间内，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摧毁国民党乡公所约20个，解放圩镇8个。这时，南路人民武装队伍迅速扩展到5000多人，

控制了遂廉化边境的广大地区。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恢复和发展，不但为南路地区人民武装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广东全省人民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此，华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方方于4月26日致函粤桂边区党委，正式批准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任命庄田为司令员，唐才猷为副司令员（以上两人未到职），温焯华为政委，吴有恒为副政委，欧初为政治部主任。

在钦廉地区，1946年8月，为了加强钦廉四属的领导力量，广东区党委决定派陈华到北海任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9月，陈华到北海后，向钦廉四属各地的党组织传达了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解放军番号，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开辟扩大游击根据地的指示。随后，钦廉四属各地发动群众，扩军增枪，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2月上旬，根据广东区党委关于开展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和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以及“南路坚持斗争的地区，应在十万大山及勾漏山”的要求，中共南路特委指示钦廉四属党组织尽快开辟和发展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为了作长期战斗，建立游击根据地，使钦廉地区武装队伍健康发展，陈华根据南路特委的指示，决定把合灵武装队伍主力西进十万大山，开辟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并将合灵南大队改编为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一营，营长苏显枢，政委徐永源，下辖两个连，共170多人；灵山莫平凡大队改编为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二营，营长莫平凡，政治教导员覃家桓，下辖三个连，共180多人；梁振威部与钟灵中队合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梁振威，政治工作负责人梁中光，下辖两个中队，共80多人。这三支队伍共430多人于2月中旬在灵（山）钦（县）边的陆屋地区汇合，由谭俊统一指挥（这时谭俊还在合浦公馆，暂由莫平凡统一指挥），西进十万大山，与钦防武装队伍共同开辟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合灵西进武装队伍在钦县贵台与钦县武装队伍会合，然后继续向十万大山进军。

2月22日，朱守刚、王旭林等率领钦防武工队和贵台地方武装袭击了防城那天乡公所，活捉反动正副乡长等20多人，缴获20多枝枪，为合灵武装队伍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国民党广西省保安团、防城县警察大队和保队等共数百人直扑那天<sup>[4]</sup>，妄图一举消灭朱守刚、王旭林等率领的武装队伍。这时，合灵西进武装队伍从钦县贵台到达防城那天，刚好与敌人相遇。合灵西进武装队伍与朱守刚率领的武装队伍取得联系后，互相配合，英勇还击敌人，终将敌人击退。随后，武装队伍继续西进，于2月底在东山稔稳地区与陈生率领的武装队伍胜利会师。几天之后，钦廉四属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俊和谢王岗等赶到东山稔稳地区。

3月上旬，在稔稳，钦廉四属武装队伍第一次胜利大会师，武装队伍的主要负责人聚集在一起，就如何发展十万山区的武装斗争和建立十万大山游击根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决定：（1）卢文率领部分钦县武装队伍，东返钦县山区活动，扩展十万大山东、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2）苏显枢率领的直属第一营与曾保率领的钦防农民翻身队互相配合，向东发展，直到江山、光波、企沙一带沿海地区，发展沿海游击区；（3）莫平凡率领的直属第二营与陈生率领的武装队伍互相配合，开往南区的谭耕、江平一带活动；（4）梁振威大队与朱守刚率领的武装

队伍互相配合，向北活动于小峰、扶隆地区；(5)指挥中心设在东山山区，由谭俊和谢王岗负责与各武装队伍的联系和统一指挥。分头活动的几支武装队伍，由于互相密切配合，取得了较好成效：先后在锅盖岭、大村、枫木坳等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民气，‘震懾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扫除了游击区内的一批反动据点，袭击了江平乡公所，为发动群众扫除了障碍；普遍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征”政策，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今后发动的三（波）光（坡）企（沙）人民武装起义打下了群众基础。

合灵武装队伍主力西进十万大山，前后历时3个月，有力地支援了十万山区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使十万山区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同时，合灵武装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战斗力，为发动公开武装斗争做好了充分准备。

1947年3月，应中共南路副特派员吴有恒和中共廉江特派员唐多慧的要求，钦廉四属派朱伟、钟古率领的合东南大队到廉江，配合廉化吴武装队伍大搞武装斗争，并命名为珠江连，途中在合博边境打败了国民党博白县自卫大队的袭击。珠江连与廉化吴武装队伍会合后，参加了长塘山战斗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4月，珠江连返回合浦，途中在合博边境又一次打败了国民党博白县自卫大队的袭击。随后，珠江连回到南康、公馆一带，扩编为合东南游击大队，大队长朱伟，政委钟古。至1947年夏，合东南大队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合东南地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队伍，为发动公开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 二、十万大山、六万大山、镇龙山互为犄角的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1947年4月初，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从北海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华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方方、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听取了陈华的汇报后指出，当前华南武装斗争是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从“小搞”到“大搞”，有条件“大搞”的可以“大搞”，未有条件的要准备条件“大搞”，不管“小搞”、“大搞”都要稳打稳扎，不能一哄而起；要注意政策、策略、路线等，不能乱打、乱杀、乱征，愈乱愈好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方方、尹林平在陈华的汇报中还了解到合灵武装队伍经常在桂中南的横（县）南、贵（县）南、永（淳）南、兴业等西江一带地区活动的情况。为了便于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广东区党委指示正在香港参加干部研究班的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把桂中南的贵县中心县委领导的横县、贵县、永淳、武宣、上林、迁江、来宾、宾阳等8个县的党组织交给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领导，并指示镇龙山（桂中南）和十万大山（钦防）、六万大山（合灵）三个地区的武装斗争要互相配合，互相援助，两广的工作方针基本一样。4月中旬，陈华从香港返回北海时，绕道贵县、南宁、钦县，向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在贵县中学刘一桢交通站用钱兴写给杨烈的亲笔信接收了桂中南的党组织关系，并积极准备桂中南起义。陈华接管桂中南党组织关系后，使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与桂中南的镇龙山连成一片，为建立三山雄峙、互为犄角的游击根据地准

备了条件。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以便加强对华南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发展华南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全国作战。5月6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正式成立，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由广东区党委领导改为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5月20日，香港分局作出《接受中央2月1日指示的决议》<sup>[5]</sup>，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当前南方党组织最中心的任务是“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号召各地党的干部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为建立新解放区而斗争。

5月底，陈华回到北海，首先向钦防党组织负责人谢王岗传达香港分局指示精神，要求坚决贯彻武装斗争从“小搞”到“大搞”的方针，主要领导人要亲自到武装队伍抓好武装斗争，建立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迅速把建立在东兴、芒街做生意的秘密交通站等交给廖铎，廖铎未到之前交陈东接收；通知合灵武装队伍从十万大山回师合灵，开辟六万大山游击根据地，策应桂中南起义，协助建立镇龙山游击根据地。同时，陈华自己也立即结束拟在北海筹开的以经商作掩护的商店，并命廖铎在半个月到芒街去履职，但廖铎不按期离开北海以致被捕。随后，陈华深入到合东南、合灵南、小江、寨圩、灵山、钦防等县区，向钦廉四属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队伍负责人谭俊、谢王岗、陈明景、卢传义、陈铭壁、包恭等传达了香港分局关于积极恢复和开展武装斗争，开辟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全国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重点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们准备让开大路，占领两侧，放敌进来，实行关门打狗策略。因此，在南方，我们必须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主动出击，以牵制敌人，配合全国解放区的反攻。”陈华传达了香港分局的指示后，钦廉地区一扫过去有关“准备十年黑暗”的悲观情绪，鼓舞了武装队伍的斗志，武装斗争开始从隐蔽防御转入战略主动，使武装斗争能够迅速恢复并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扩大了武装队伍，至1947年底，合灵武装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

谭俊、陆新接到陈华关于把合灵武装队伍从十万大山回师合灵的指示后，立即吩咐钦防武装队伍继续巩固和发展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并按照陈华的指示把西进十万大山的合灵武装队伍分海陆两路回师合灵。其中，由谭俊、陆新率领的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一营和梁振威大队从东山转移到江山乡的枫木湾（企沙）后乘船返回合浦西场。不久，国民党合浦县黄超成大队前来围攻，谭俊、陆新率领战士们奋勇还击，突破黄超成大队的围攻后转移到灵南。由莫平凡率领的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二营从陆路返回灵山，途中袭击了申安乡公所，取得了胜利。1947年6月初，西进十万大山的合灵武装队伍胜利回师合灵，建立了六万大山游击根据地，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学习，以提高武装队伍素质，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结合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等文件，重点解决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作风，要求干部战士进一步树立和增强武装队伍的政治观念、群众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6月上旬，谭俊、陆新率领的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一营在灵南作短期休整后，转移到合东南（公馆区），与白石水、西场武装队伍以及合东南大队集结在公馆区六湖垌大王山村吴屋祠。这时，陈华从

北海到达公馆六湖垌大王山村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开展武装斗争，谭俊、陆新、陈明景、朱伟、苏显枢、卢传义、梁中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一营、西场武装队伍、合东南大队、白石水赖作亮连和梁振威大队等，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简称合浦二十四团），团长陆新，政委陈明景，副团长朱伟、苏显枢，参谋长卢传义，政治部主任梁中光，参谋包恭、李成、李明。合浦二十四团下辖7个连，共520多人。

合浦二十四团组建后，首先攻克了反动据点国民党东成乡公所。东成乡公所位于公馆区六湖垌秀村径口附近，是国民党退役师长张枚新、合浦县军官大队大队长张相琦和璋嘉地霸所控制的反动堡垒，平日勒收苛捐杂税，鱼肉乡民，时常“扫荡”革命村庄，迫害革命群众，残杀革命者。因此，合浦二十四团按计划首先攻克东成乡公所。6月15日，合浦二十四团从驻地出发，迅速占领东成乡公所周围山头，准备围攻东成乡公所。这时，乡兵见势不妙，只好缴枪投降保命。于是，合浦二十四团突击队冲进乡公所，俘获全部乡兵，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6月16日，合浦二十四团向公馆圩镇挺进，到达白沙时惩治了反动分子杨道平后，继续东进。但当合浦二十四团到达山口滨海荣归塘村（国民党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的家乡）时，突然遭到当地反动武装在村庄炮楼四处开枪射击，合浦二十四团被包围，陷入险境。这时，陈华率领合浦二十四团奋起还击，突破敌人的包围，继续向东挺进，于6月下旬在廉江游击区金屋地与廉江部队李树德团会师。6月30日，合浦二十四团与廉江部队互相配合，攻克了国民党廉江东福山乡公所。陈华在廉江会见了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温焯华、副书记吴有恒和香港分局派来的代表林美南、钱兴，并向他们汇报了执行香港分局和粤桂边区党委指示以及钦廉四属工作安排、接收桂中南党组织关系的情况，陈华还向林美南汇报了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全面正式恢复后过去的联络员已改为特派员的有关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陈华到北海后所做的各项工作。林美南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批书送给陈华，钱兴也把刘少奇的《立异求同》和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农村阶级分析》等党内文献送给陈华，这些宝贵的书籍、文献成为陈华回到白石水开展整党、整军、建党、建政的重要思想武器。

合浦二十四团在廉江活动20多天后，香港分局和南路特委指示合浦二十四团返回合灵，大力加强六万山地区革命斗争，并准备抽调队伍挺进广西横县南部策应桂中南起义，开展横南武装斗争，开辟镇龙山游击根据地。于是，陈华率领合浦二十四团离开廉江返回合浦，并于7月20日回到合浦县白沙乡龙颈村，把合浦二十四团二连和八连驻扎在龙颈村东北山后的白莲寺，团部和其他5个连驻扎在龙颈村里及附近村庄。7月21日，由于部队渡过白沙河开进驻地时暴露，瓦窑岭反动保长杨善崇向白沙乡乡长林家伟报告。林家伟电告国民党合浦县、博白县当局，当局立即派国民党合浦县、博白县两个自卫大队和当地反动武装共500多名敌人，向驻扎在龙颈村和白莲寺的连队进攻，当天下午2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共毙伤20多名敌人，但驻扎在白莲寺的八连连长邓振松、排长刘桂以及4名战

士不幸牺牲，团参谋李成负重伤。这时，团领导考虑到继续战斗下去只是拼消耗，便命令部队边打边向香草江方向撤退，下午7时到达香草江，敌人也不敢追击。随后，合浦二十四团经过公馆南山、六湖垌，再渡过南流江于7月下旬回到合浦革命老区白石水。这时，白石水区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地方恶霸、反动分子气焰十分嚣张，实行连保、并村、围闸，建立保队，经常放哨、设卡，暗探、狗腿横行，人民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因此，合浦二十四团回到白石水区时，群众不敢公开支持和接近部队，恐怕像以往一样部队住下不久又撤走，而群众又再次遭殃。在这种情况下，合浦二十四团只能白天在山上住宿，晚上秘密下山到各村庄做群众工作。群众见到曾在白石水坚持了五六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政委陈明景和团长陆新突然出现，并带回来一支士气高涨、武器齐全的部队，真是喜出望外。一些群众流着眼泪向陆新、陈明景诉称牛神水村保长吴佳元盘踞到耽、牛神水两个村庄，经常率保队袭扰革命村庄，捕杀军民，对革命危害很大，群众对吴佳元恨之入骨。因此，合浦二十四团决心顺应民意，摧毁这两个反动据点，除掉反动保长吴佳元。11月，吴佳元率保队外出作恶，被合浦二十四团二连和教导队追击、包围在平垌村，双方战斗了一昼夜，反动分子被迫投降。在战斗中，共毙5名保丁，俘吴佳元等5名保丁，缴获11枝枪。接着，合浦二十四团在谷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吴佳元，并把吴佳元当场枪毙。此举使当地一些反动分子受到震慑，纷纷前来投降、求和或表示中立，到耽、牛神水两个反动据点不攻而破。从此，白石水区的革命之火又熊熊燃烧，税收征粮工作也开展起来，逐渐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创建了六万大山游击根据地，为发动公开武装斗争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在开辟和巩固六万大山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开辟了镇龙山游击根据地，形成十万山、六万山与镇龙山互为犄角的游击根据地。

1947年5月14日，钦防地区党组织发动和领导防城县三波、光坡和企沙的农民武装起义（简称三光企起义）。起义队伍组成农民翻身独立大队，进行开仓济贫，收缴反动武装，镇压国民党特务和地主恶霸，袭击防城狗岭反动据点，歼灭县警大队一个分队。随后又乘胜进军江平、江山，接应华石镇自卫大队起义，分兵袭击龙门港。6月初，农民翻身独立大队和马届山区游击队以及防城县小峰、那马等地农民武装，统一整编为钦防农民翻身总队（简称农民总队），总队长朱守刚，政委谢王岗，政治部主任卢文。农民总队下辖6个大队，共1500人。6月13日，农民总队攻打东兴并取得胜利。接着，钦县的上思、爱店等地也纷纷起义。钦防两县武装队伍的节节胜利，使国民党统治者十分恐慌，国民政府广州行辕急忙在防城增设“钦防清剿指挥部”，调广东保安第九总队驻守钦防。农民总队为避敌锋芒，从光坡滨海地区撤退到山区。8月4日，广西保安第六总队和钦县、上思地方反动武装共1000多人，分两路进犯马届山游击区，农民总队第二、第四大队在洞利与敌人激战3天，击退了敌人。8月30日，国民党反动派再次纠集反动武装2000多人进犯马届山游击区，农民总队以4个大队的兵力在那天、白霞岭一带抗击敌人，激战数日。战后，敌人一步步向山区进逼。于是，农民总队在高丽召开会议，

决定独立大队和第三大队返回防城，第二、第四大队在马届山游击区坚持斗争。9月，广东保安第九总队调走，农民总队乘此时机进行整编，把防城县武装队伍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团（简称防城二十团），团长沈鸿周，政委彭杨；把钦县武装队伍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团（简称钦县二十一团），团长朱守刚，政委卢文。

1947年7月，莫平凡率领的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二营，与坚持在灵山斗争的陈铭金率领的黄式高大队会合，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团（简称灵山十八团），团长莫平凡，政委陈铭金。灵山十八团下辖7个连，共600多人。这时，陈华任命谭俊为灵（山）、横（县）、永（兴）特派员，并指示由谭俊、陈铭金、莫平凡率领灵山十八团北进广西横县南部策应桂中南起义，与横南武装队伍一起开辟横南游击区，开辟镇龙山游击根据地。8月10日，谭俊在灵山佛子区蓬葵麓主持召开灵山十八团干部会议，传达香港分局和陈华关于进军横南的指示，分析当时的形势。会议决定按香港分局和陈华的指示精神，从灵山进军广西横县、永淳县，策应桂中南起义，协助创建镇龙山游击根据地，为造成十万大山、六万大山、镇龙山三山鼎立，互相呼应，建设更加广泛和巩固的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8月26日，灵山十八团开始向横南进军，途经芳龙白松坪时，遭到灵山县反动武装200多人的拦击，灵山十八团抢占了血场岭高峰，毙伤数名敌人，将敌人击退。8月28日，灵山十八团先后击溃了横县一个中队、六嘉乡苏孔阶一个乡队和黄润堂大队，于当天下午4时左右到达横县上南同宣乡北敢村。8月30日，中共横县地下党在同宣地区工作的刘一祯、农汉会见谭俊、莫平凡、陈铭金等，介绍了横南情况及武装起义计划，双方共同商讨十八团配合横南武装起义的行动方案。接着，灵山十八团渡过沙坪河，进驻凤凰村，支援刘一祯、覃雄等领导的横南人民武装起义。9月1日，刘一祯、覃雄等率领200多人举行横南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定名为横县人民解放军横南大队，大队长覃雄。灵山十八团与横南大队兵分两路，一举摧毁了同宣、独灵、飞龙三个乡公所。9月4日，杨烈、刘一祯、陈清源等领导横北人民举行横北武装起义，接连攻陷青桐、陶圩、连塘等几个乡镇公所，解放大片农村。

郁江两岸的人民武装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广西当局。9月13日至14日，广西省保一团和第四区保安队相继集中到横县县城，企图与横县反动团队一起消灭横北起义队伍。谭俊获悉情报后便在同宣乡彭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策应支援横北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决定灵山十八团主力及横南大队共同进攻郁江两岸的重镇江口，封锁郁江通往南宁的重要交通线。9月15日，灵山十八团主力三个连及横南大队向江口进军，攻陷了设在江口的横县上南区公所、龙门乡公所和广西第二盐关所。接着，灵山十八团又派一个连到江口与飞龙之间的鸡笼滩一带河段封锁郁江交通，使梧州、广州的船只不能通往南宁，横北的国民党保队被迫派一部分兵力到横南来，这样达到了策应支援横北武装起义的目的。10月初，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横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杨烈将横南地区党组织关系交给谭俊，随即整编横南大队，改名为横南独立营，营长覃雄，归灵山十八团管辖。同时，成立同宣乡武装动员委员会，主任蒙英翰，动员人

民群众参加民兵组织。10月中旬，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打通郁江交通线，派广西保安队第一总队以及横县、永淳团队共2000多人进犯同宣乡彭村及大岭。灵山十八团与同宣全乡民兵一起抗击敌人，并击败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共毙伤30多名敌人，最后敌人只好撤退。10月24日至11月10日，灵山十八团摧毁了独灵乡乡长方振雄、同宣乡副乡长蒋天佐两个反动据点。11月13日，灵山十八团又击退了广西保四团、保六团和永淳县大队共2000多人的进犯。

与此同时，桂中南地区的上林、贵县、武宣等县也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没有与六万山、十万山的人民武装相配合，回旋余地小，不久都受到了挫折，只能分散活动。只有横县武装起义队伍与灵山十八团互相配合，愈战愈强，成为桂中南的骨干武装力量。

灵山十八团挺进横南4个月来，与敌人展开大小战斗30多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击败敌人进攻，毙伤敌600人，俘170多人，摧毁4个反动乡公所，缴获各种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给予国民党在桂中南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同时，支援了横北武装起义，帮助横南组建了400多人的横南独立营、80多人的青年武工队和300多人的民兵组织，建立了镇龙山游击根据地，使横南游击区与灵山游击区连成一片。随后，把横县武装起义队伍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简称横县十九团），团长刘一桢，政委杨烈，共600多人，使粤桂边人民武装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遂溪、廉江、化县、吴川等中心地区的武装斗争。

至此，建立了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与镇龙山互为特角的游击根据地。由于贯彻执行香港分局关于“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钦廉四属人民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这时，钦廉四属武装队伍发展到2800多人，桂中南地区武装队伍发展到600多人，共有5个团：合浦二十四团、灵山十八团、防城二十团、钦县二十一团、横县十九团，为钦廉四属和桂中南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清剿”奠定了基础。

### 三、北海“四眼刘”事件

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传到南路地区后，南路人民的武装斗争更加活跃，频频出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特别是遂溪武装队伍击毙国民党遂溪县县长戴朝恩之后，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更为恐慌，深感南路人民武装的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一方面调集重兵对南路人民武装发动“重点进攻”，加紧对南路人民武装的“清剿”；另一方面加紧特务活动，妄图从内部破坏南路的中共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北海发生了“四眼刘”事件，使北海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1946年6月，为了恢复和发展钦廉四属党的工作，中共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廖铎（刘鑫，绰号“四眼刘”）到合浦任中共廉北联络员，负责合浦、北海地下党的工作。廖铎曾因生活腐化犯错误受过处分，起初不愿意到合浦工作，经组织动员后才勉强到任。廖铎到合浦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调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整顿廉北党组织，审查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廖铎到合浦前考虑到北海市镇大，商业人口多，故决定驻在北海，以商

人面目出现掩护身份。廖铎到北海后，先后在文明路、商会附近和珠海路的“永丰行”居住，还设了6个交通联络点：张放家、广瑞祥药行、华商行、南安客栈和陈家客栈附近的熟烟摊。廖铎通过上述3个住处和6个交通联络点与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并在张放、卢传义、岑焕祥等协助下，经过调查考察先后恢复了廉北区一批党员的组织生活。9月，广东区党委任陈华为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到北海后以商人身份出现，并通过廖铎与钦廉四属各地的党组织联络员谭俊、陈铭金、谢王岗等联系，开展审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恢复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关系和恢复武装斗争的工作。这时，廖铎直接受陈华领导，主要是往返北海和南康做些联络工作。

1947年4月，陈华到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汇报工作。5月，陈华从香港回到北海后，根据香港分局关于华南武装斗争贯彻从“小搞”到“大搞”的方针的指示精神及形势的需要，决定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负责人要亲自到部队抓好武装斗争，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决定将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机关从北海转移到游击区部队中去。陈华离开北海前，布置廖铎准备撤退廉北区的党员，结束在北海的商业掩护业务，前往防城东兴接收设立在东兴和越南芒街以商业作掩护的秘密交通站。但是，廖铎却贪图安逸，害怕艰苦，迟迟不肯动身去东兴，也不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

原南康大队大队长陈普坤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并供出南康三中党支部书记刘张敬等学生党员。1947年5月底，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陈普坤从湛江回到合浦，与国民党中统合浦站站站长谢有恒等特务，秘密潜回南康，阴谋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合浦地下党组织得知陈普坤潜回南康后，立即布置刘张敬等撤退。6月5日，刘张敬在南康扫管龙村召集部分党员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会后回家与家人告别后撤退。6月6日，陈普坤、谢有恒等特务到南康三中逮捕了姚克鲁（姚信厚）、陈继芳等14名进步学生，并逼迫陈继芳等带路到企岭等村搜捕刘张敬。刘张敬因麻痹大意而从扫管龙村返回企岭村与家人告别时，被守候在其家的特务逮捕了。刘张敬被捕后叛变，出卖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廖铎。陈华得悉刘张敬被捕叛变的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考虑到安全问题，陈华又在从公馆转移六万山区的途中写密信给廖铎，指示廖铎采取应变措施：(1)结束北海掩护领导机关的生意业务；(2)撤退廉北区的党员；(3)护送李俊瑜（陈华的爱人）到越南芒街去；(4)廖铎尽快撤退到东兴。这时，廉北区的党员已分别接到党组织通知，做好了准备撤退的工作，只等廖铎的命令，但廖铎迟迟不执行陈华的指示，仍然没有向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国民党特务得知廖铎的情况后，极为重视，国民党广东第八区专署特警队专门组织了侦缉中队，对廖铎进行跟踪监视，并派刘张敬带领特务邓敏平等于6月21日到北海守候准备逮捕廖铎。6月23日傍晚，在北海经商的彭尚仁（廖铎在化县教书时的学生）到“永丰行”探望廖铎，并相约外出逛街，当廖铎与彭尚仁走到中山东路东二巷时被特务逮捕了。廖铎在特务的审问中供认了自己中共党员身份，并要求与特务的头面人物会面。6月24日上午，第八区专署参谋王振宇和中统合浦站站站长谢有恒专程赶往北海

与廖铎会面，在王振宇、谢有恒一番诱降后，廖铎彻底地叛变了，口头供出他所掌握的北海地下党党员的情况（包括姓名、住址、职业、特征等）。随后，为了彻底破坏南路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指令廖铎书写有关南路党组织的情况以及共产党的一般活动规律与方针等情况。廖铎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书面材料主要有：（1）廖铎的个人简历及自白书；（2）党的上下级在各地的交通联络站；（3）广东省南路党的组织系统，各级党的负责人和各县党的负责人，各县重要党员干部；（4）南路党的军事负责人，军事力量与分布情况；（5）共产党的方针与政策；（6）党群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等。廖铎在书面材料中列出了南路党政军领导人、普通党员及党外进步人士共 200 多人的名单，全面出卖了南路党组织情况。

由于廖铎到北海前是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因此廖铎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书面材料，对南路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当局根据廖铎提供的情报在南路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捕。而由于南路各地绝大多数党组织领导成员和党员骨干都已参加武装斗争了，部分党员也预先转移隐蔽了，因此这次事件对南路党组织的损失减到了最低限度。但在北海的地下党组织却遭到了严重破坏，6月26日晚上至翌日晨5时左右，国民党第八区专署军警按照廖铎列出的名单，大肆搜捕北海地下党员，先后将党员苏俊才、劳锡璟、吴国良、陈秉洁、林西平、苏少芳、李俊瑜、巫海秋、吴涛等及群众陈仲桐、麦佳、詹建材拘捕，并押送到廉州，分别关押在八区专署和警局。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北海高德乡黄屋村逮捕了地下党员黄锡豪。至此，北海党组织除陈琪等个别党员侥幸逃脱外，其余 10 多名党员均被逮捕，损失很大。被捕的党员在狱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凭共产党员的忠贞气节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经受敌人各种严刑逼供和鬼域伎俩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保护了党组织的秘密。敌人见在北海逮捕的党员中打不开缺口，便采取了更加奸诈的手段，即停止公开逮捕党员，故意不逮捕廉州的党员，企图麻痹钦廉四属党组织，并利用陈华的爱人李俊瑜设下“放长线、钓大鱼”的圈套，捕捉陈华等钦廉四属党组织负责人。9月，因陈普坤等被捕叛变而到越南隐蔽的廉州党组织负责人岑焕祥，从越南回到廉州家中即被陈普坤的岳母刘秀英带领便衣特务秘密逮捕。岑焕祥被捕后将计就计，作假投降，骗取敌人的信任，于 1948 年 8 月带领李俊瑜一起逃走，来到公馆浪坡村找到陈华、徐永源等。岑焕祥把他被敌人秘密逮捕，中统、军统特务所设圈套，而他如何将计就计骗取敌人信任营救李俊瑜出狱和逃走的经过向陈华作了坦白交代。随后，合浦党组织对岑焕祥作了全面的政治审查，经过多方面考察，证实岑焕祥的交代基本属实。鉴于岑焕祥能冒着极大危险带领李俊瑜逃走归队，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经六万山地委批准允许其重新入党。

“四眼刘”事件发生后，党组织对被捕的北海地下党员和群众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党组织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及官员的腐败，通过统战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进行多方营救，并发动被捕者家属各自上诉配合，终于使被捕的大部分党员和群众得以释放出狱，只有少部分党员直到北海、合浦解放时才得出狱。

“四眼刘”事件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陈普坤先行叛变，出卖刘张敬，刘张敬又叛变出

卖廖铎所致。但是，有几点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1)严重的政治思想麻痹。当合浦地下党组织得知叛徒陈普坤秘密潜回南康，阴谋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后，立即布置刘张敬等撤离南康，到六万山区参加武装斗争，但刘张敬因麻痹大意，擅自返家与家人告别而致被捕。陈华离开北海时布置廖铎撤离北海前往东兴，但廖铎却贪图安逸，迟迟不肯动身去东兴，又不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刘张敬被捕叛变后，陈华又密示廖铎要迅速撤离北海前往东兴，但由于廖铎政治思想麻痹，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患得患失，行动拖拉，不及时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导致“四眼刘”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2)指导思想不正确。1946年是南路党组织历史上较艰难的年代，由于强敌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党组织活动困难很大。在此严峻的局势下，党组织没有吸取合浦永信烟庄事件的教训而及早地转移到农村去，党组织负责人，甚至已公开的武装总队负责人也经常来往于北海这个闹市联系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一严重的错误。(3)个别党员意志薄弱，投机思想严重。1946年春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广东将有十年黑暗”的指示时，虽然绝大多数党员都坚定地坚持斗争，但个别意志薄弱的党员却在这时脱离队伍，而陈普坤则充当了革命的叛徒。到1947年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革命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刘张敬、廖铎等正是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到来，加上个人品质恶劣，投机思想严重，希望在党内得到好处，却缺乏对党忠诚献身精神。因此，一旦被敌人逮捕后，面临追求党内好处的幻想成为泡影，就很易被敌人威逼利诱所收买，在生死攸关时刻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特别是廖铎，他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曾担任过地方党组织的重要职务，但被捕后在身份尚未完全暴露，敌人尚未动用任何刑罚的情况下，便“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全面出卖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成为革命的最凶残的敌人。

#### 四、加强党的建设与合浦工委的恢复

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正式全面恢复后，注重加强党的建设，以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同时，恢复和建立了武装队伍和地方的一些基层党支部，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1947年9月至10月，为了加强党的建设，钦廉四属党组织在合浦大成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干部学习班、训练班，开展整党、整军、建党、建政的思想教育，连队和区级以上负责干部30多人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农村阶级分析》和刘少奇的《立异求同》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分析形势，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纪律、党性、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增强了干部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尤其使干部对红色割据，建设根据地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教育认识较深，使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为了加强合浦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陈华在学习班上主持成立了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陈明景，组织部长卢传义，宣传部长梁中光。合浦县工委隶属钦廉四属特派员领导，下辖中共合东南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灵南区工作委员会两个区党委组织。合东南区工委：书记卢传义，委员陈铭壁；下辖6个支部，即南康支部、白沙龙颈支部、宏德支部、良屋支部、充美支部、东成支部。灵南区工委：书记陈廷，组织委员朱有玑（朱基），宣传委员李明。但由于武装斗争比较激烈，为粉碎国民党的“清剿”，大部分地方党员骨干兼管人民武装队伍，随队伍进行活动，所以很多地方党支部未能恢复。至此，被撤销4年半之久的合浦县委机关又重新恢复，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使合灵地区的武装斗争能更好地发展。

学习班结束后，钦廉四属党组织立即组织干部和武装队伍向钦灵边的伯劳一带发展，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使合、灵、钦边和合东南地区逐步连接起来。同时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为合灵地区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清剿”奠定了基础。

---

[1] 《中共中央给方方、林平电》（1946年11月1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6卷，第152页。

[2][3] 《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第299-300、303页。

[4] 那天，是地名。

[5] 2月1日指示，即毛泽东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